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color photograph showing an aerial view of a valley. The valley is filled with green terraced fields and a small cluster of buildings, likely a village. The surrounding hills are covered in dense green vegetation. The sky is a pale blue with some light clouds.

客家話詞典

[普通話對照]

陳慶忠 編纂

銀河出版社

客家话词典

[普通话对照]

陈庆忠 编纂

曾天来
崇 恒 淘 振
鼎 敬 翁 耀
泰 程

客家话词典

〔普通话对照〕

陈庆忠 编纂

香港银河出版社

香港九龙大埔道 160 号 A 地下

开本 850×1196 1/32 字数 40 千

印张 17.25 印数 1700 册

2002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62 - 475 - 546 - 9

定价:港币、人民币 40 元

序

这部《客家话词典[普通话对照]》编纂者陈庆忠教授，曾是抗战前我做地下工作在梅县雁洋堡学堂（现在雁洋中学的前身）教书时读高小的学生，他的祖父德楼先生当时也是我的同事，随后他毕业升入丙村中学读初中，东山中学读高中，我和德楼先生为适应抗战形势也同时离开了雁洋公学，从此便失去联系。但庆忠的名字和相貌在我的脑海中仍是清晰的，因此四十多年后我在广东省教育厅厅长任内他从北国哈尔滨回梅县探亲途经羊城来看我时，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了。前年他又携带一本他的新著《古代汉语语法》来羊城看我，始知过去他一直在商业部部属院校黑龙江商学院任教，学有专长。现在他又携其新编纂的《客家话词典[普通话对照]》原稿来请我审阅并要求为其作序，感于其长久在北国读大学并参加工作而始终不忘祖宗言——客家话，并以其离休后可以安度晚年的岁月从事客家学方面研究之热忱——此前他曾在广东之《客联》杂志1998年第4期发表《客家先入迁入梅州探源》，又在北京之《中华新论·全国优秀理论研究成果信息库》入选《客家民系文化简论》等研究文章，便答应下来了。

客家话为现代汉语的重要方言，在全球特别是南洋群岛诸国随着客家人的涉足和定居也散布很广，也可以说是一种具国际性的现代汉语方言。但在全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客家话的作为一种方言，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为促进全国各省区市的互相联系、互相支援、互相交流，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各大方言区大力推广和普及现代汉语共同语——普通话。庆忠的这一部词典，正是为响应中央的这一号召，为满足客家人学习并掌握普通话的急切需要而编纂的，

它的出版可以说是恰当其时。我观其全书，所收词目十分丰富，举凡客家话中与普通话有差异的日常生活、生产、工作、学习用语，无不搜罗净尽，计有一万四千多条，其词目首字即达三千多个，占常用汉字百分之九十以上。可以说，它不仅是一部客家话词典，又是一部客家话常用字字典，它融客家话字典与词典于一炉，此外还收入不少客家地区流行的俗语、谚语、歇后语以及充分反映客家话特异语法事实、语法现象的词目，都用客家话拼音方案声韵调标音；而与其对照的普通话词语，无论释义、对译和标音都相当准确。它确实是一部适用于客家人查客家方言词语和学习普通话的词典，也是一部适用于非客家人学习和研究客家话的词典。对于客家人特别是在官话区生活和工作的客家人和考入官话区就读大学的客家学子，它是学习普通话的一部很好的入门书和必读书；对于非客家人，它也是学习和研究客家方言的一部重要的工具书和参考书。

值此该书付梓之际，我作为客家人的一员，作为曾是陈庆忠教授的启蒙老师，对其此一学术成果充分肯定，特向全体客家乡亲、客家学子和有志于学习和研究客家方言的同志和学者加以推荐。是为序。

梁集祥

2000年4月14日于广州市教园寓所

凡 例

一、本词典所收词目，为客家话中与普通话有差异的词语，其顺序按汉语拼音字母音序排列，凡首字相同的词目按音节由少至多排列，其首字多音的各音词条也排在一起，用客家话拼音方案或梅县方言的声韵调标音；然后，用破折号引出与客家话词语相应的普通话词语与之对照，用汉语拼音方案标音，其无相应词语者则标同义词或详加解释。为客家人学习普通话的需要，有的词语客家话与普通话同形但读音差别较大者，也尽量收入。

二、本词典广为搜罗，共得客家方言词目 14362 多条，词条首字 3185 字（多音字只计一字），占常用汉字三千五百的百分之九十一。按其词语类别，包括单音词、多音词、成语、俗语、谚语、歇后语（先说喻体稍歇再说成正意）等，按其意义分类包括天文、地理、时令、时间、空间、方位、农林牧副渔、工商、贸易、交通、邮电、文化、教育、学习、工作、娱乐、旅游、体育、房舍、美容、服饰、起居、饮食、讼事、交际、境遇、思维心态、人的状态、婚丧、生育、寿辰、神鬼、祭祀、身体、疾病、医疗、人品、性格、职业、称谓、亲属、动作、行为、日常生活、居住环境、番域侨情、动物、植物、器物、用品、物态、指代、程度、范围、介绍、询问、迎接、比较、数量、结构、时态等。其中属于词的，包括名词、代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数词、量词、叹词、助词、语气词等。

三、本词典所收客家话词目，着重口语词目——口语语料较书面语语料更为可靠，所以注音主要注口语音（白读），但也不排斥读书音（文读）。例如“儿子”的“子”，注 zɿ，为读书音，“老妹子”的“子”，注·iê，为口语音。客家话调类有六：阴平、阳平、上声、去声、阴入、阳入，与普通话调类相比，多阴入、阳入两类。本词典标调方法，与普通话相同的调类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采用普通话的标法，普通话所无的调类，阴入用“ˊ”标调，阳入用“ˋ”标调。口语词条有音无字的，标出办法：①在传统字书中有本字的，用本字；②找不出本字的，用借音字，借音字并尽量用意义上相靠近的；③有的用客家话特殊字；④其音无法用字标出的，用“口”表示，计共有 185 个。

四、本词典主要收入客方言区常用的意义单纯、范围确定的多音词。因单音词词性不稳定，词义复杂多变，读音多变，所以除了非收不可的之外，一般不收。多义词主要找与本义相当的普通话词与之对照或对译。单音词或多音词在客家话词义不止一项的，用①②③……标明其各种意义。有的词单释义不足以了解其用法者，则举例加以说明之。

五、本词典还收入一些客家话特殊句式的词目，如特殊的反复问句、倒装句、比较句、提宾句等，读者从中可以掌握一些与普通话句法不同的客方言特殊句法。

六、本词典所收客家话词语，以梅州地区梅县、梅州城区方言词语为主，其他区、片与之有异的收入就略少，其标音也主要用梅县、梅州城区方言声韵调。由于客家方言无论读音和词语都有地区的一些差异，局限性和片面性在所

难免。

七、为方便客家人读者按客家话读音查客家话词语，本词典正文后特备一《客家话同音字查词索引》，此索引也可帮助客家人认识客家话中的同音字。

八、本词典主要适用于讲客家话的人查客方言词语，了解它的普通话相应词语（或意义）及其读音，所以对所有词语都不追源溯流。查找时，可先在词目首字检索表中，也可在客家话同音字查词索引中查到该词目的首字，然后按其所示页码，即可找到该词语。

九、本词典词目首字检索表中所注音为客家话读音，该检索表即相当于一份客家话常用字读音表。如只查一些客家话常用字的读音，只查该检索表即可。

十、本词典为方便读者全面了解和认识客家的源流、民系的形成与客家话的形成和分布地区以及本词典的编纂目的、意义、局限等，特在正文前安排一导论；为帮助读者使用本书，还在正文后安排一附录，内容包括关于拼音方案等一些必要的资料。

导 论

一、词典编纂的目的、意义和局限

现代汉语是一种多方言的语言，其各方言在其特定地区和场合都具有自身的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在语言中，词汇特别是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是语言的基础，其中负责文化的任务主要是由词汇，特别是实词词汇承担。在现代汉语中，诸方言语音有严整的对应规律，语法的差别很微，词汇的分歧不大。每一种方言除共有的汉语基本词汇外，又有其自身的方言词汇，这方言词汇在当地人民群众口头上长期流传，生动活泼，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文化色彩，除偶尔有一些为作家所采用外，很少见于书面语言。所以编纂方言词典无论对整个现代汉语的研究和对方言区人民的交际，都是十分必要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的过程中，由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广播、电视等文化媒体的普及，国际、国内交往的日益频繁，语言的趋同化倾向已成定势，现全国正在大力推广、积极普及现代汉语共同语——普通话。但不可讳言，方言所造成的严重隔阂依然存在，并且已经成为阻碍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推广规范的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从而更把编纂方言和普通话对照的词典提到议事日程。本词典就是为适应这一需要而编纂的。

客家话是汉族客家民系的语言，它是现代汉语十大方言之一，其通行地域包括广东、福建、江西、广西、湖南、四川、海南、台湾、香港、澳门等省区的一些市、县、区和全世界亚、欧、非、美、大洋洲等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估计说客家话的人口在四千五百万——八千万之间。（据香港崇正会 1970 年所作的统计和 1973 年世界客属第二次恳亲大会

的资料记载，全球客家人的总数在 4500 万左右；据梅州市为迎接 1994 年第十二次客家恳亲大会多渠道调查汇总为 6650 万人；据香港经济与法律出版社督印、总编辑陈应良《面临当代潮流挑战的客家人应采取的策略》（载《梅州文史》第七辑，1994 年印）一文载：“资料显示客家人总人数约一亿二千万人，其中在大陆一亿多人，台湾地区四百多万人，港澳及海外各国约有一千万人。”此数字估计偏高。）但其中会说客家话又会说普通话的人相对较少。为了给客家人提供一部比较完整的客家话词典和支持在客家话地区推广和普及普通话，帮助说客家话的居民能与说普通话的居民相互进行语言交际，达到既会说客家话又会说普通话的双语化标准，同时也为讲普通话和其他方言的人了解或学习客家话，我们特编纂了这部《客家话词典[普通话对照]》。这部词典首先是一部“客家话词典”，它收入客家话方言词语即与普通话有差异的词语，内容包括生活、学习、工作等各个方面，达 12000 条以上，包罗了客家方言词汇的有代表性的部分，从它即可从词汇上认识客家话；其次才是一部“普通话对照”的词典，所有客家话词语都用普通话相应的词语予以对照（或解释），以使客家人读者能从客家话词目中查找到相应的普通话的说法并读出音来，从而学会说普通话。当然讲普通话或其他方言的读者也可以从客家话词目查找到相应的普通话说法，转过来再认识客家话的说法并读出客家话音。

本书编纂者用对照的方式来编纂这部词典，其意义在于比较。所谓“对照”，就是一种比较。比较的方法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事物在比较中显示其本质特征，所以学术研究和语言研究都常用比较的方法。比较是分析的基础，通过比较，事物的特点因之更加鲜明，也更有利于揭示其内在的蕴涵，把比较所获得的一切成果置于历史的展望之下，其面貌将更明显地表露出来。客家话和普通话是共同语和方言的关系，拿客家话方言词语与普通话相应词语加以对照，不仅有助于说客家话的人学习普通话，还有助于说其他方言的人了解客家话。更何况整体包含在具体之中，具体各自从不同角度显现整体，这部客方言词典也可给研究

汉语史和研究汉语方言的人提供众多的实际语言材料即语料，而语料则是语言研究的对象和基础，所以，这一种对照，除了具有实用价值之外，也具有一定的学术含量。

其次所谓“对照”，实际上是一种“概念转译”程序。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把语言符号理解为“把一个概念与一个有声意象统一起来”，概念即所指，有声意象即能指，两者合起来就构成一个符号，即词语。要把客家话词语和普通话词语加以对照，首先要把客家话词语转译为普通话词语，然后才能把它们摆在一起加以对照。而这一种转译是并不容易确切的，这是因为词语是一种语料，它具有文化内涵，文化内涵积淀深厚的词语，对于阅历不深、经验不丰富的人，理解往往有一定的困难，其所指和能指的把握不一定准确。使用同一方言的人们，由于自幼浸淫于母语环境里，在听觉上会逐步形成对母语中诸音位特有的共振频率以及超音段特征的敏锐感觉，在直接对话中凭借自己的语言直觉自然会获得一种语境感受，即一种对母语的毫不思索的直观判断能力（语感），它不仅包括对于语音（和文字符号）的感觉，对言语（和书面文章）准确而又灵敏的感受、领悟能力，而且包含着感知、理解、情感体验在内的言语活动过程。其中语音感即对语音的敏感，语义感即对一个词的意义和色彩的敏感，语法感即对一种语法现象是正常还是特殊、几种语法格式之间的相同相异等等的敏感，特别是方言虚词，语感非常重要，这种语感使语词的某些外缘意义或隐示意义得以表达，从而产生完整、准确的话语效应。米歇尔·福柯说：“一个语词只有特定话语的范畴才能获得意义，也才有被人说出的权力。”（《性史》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1月版）但当这些词语进入词典变成词目，便失去了特定话语的范畴及多种语感感受条件，语感欠缺，而且方言词的许多微妙之处往往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在特定时空下的语言行为很难用另一语境中的语言准确地解释和替代。我们对与普通话词目对照的每一客家话词语虽曾花了很大气力去转译，但也不一定每个词目都能转译准确，这可以说是本词典存在的一种局限。此外，虽然各地区的客家话大同小异，彼此

都能自由交谈，但本词典的词目主要采自梅州市管辖的各县区特别是梅县和梅州城区，词目标音也是主要根据梅县和梅州城区音，这不能不说又是一种局限。以“择”、“鸡媛儿”为例，其来源虽同为中古宕摄铎韵定母徒落切（择）、中古山摄一等来母去声（媛），但广东、福建、江西等地区读音都有不同：

“择”（挑选）：梅县 t'ɔk₂ 东莞（清溪）t'ɔk₂ 翁源 t'ɔk₂ 河源 t'ɔk₂ 揭西 t'ɔk₂ 南雄（珠玑）t'o₂ 新丰 t'ɔk₂ 增城（程乡）t'ɔk₂（以上属广东）秀篆 t'ɔk² 武平 t'ɔk² 长汀 t'o₂ 宁化 t'o²（以上属福建）于都 t'r² 宁都 t'ɔk₂ 铜鼓（三都）t'ɔk₂ 赣县（蟠龙镇）t'o² 大余 t'o₂ 瑞金 t'ok₂ 上犹 t'o² 南康 t'o₂ 定远 t'ou² 全南 t'o₂ 定南 t'o₂ 资溪 t'o₂ 井岗山 t'ɔk₂ 石城 t'k₂（以上属江西）廉江（石角）t'ɔk₂ 桃园 t'o₂

“鸡媛儿”（还没下蛋的母鸡）：梅县鸡媛儿 ɛkelon². ɛ 永定鸡媛 ɛkei² lɔo 新丰鸡媛 ɛk ɛ ilɔo² 南雄（珠玑）鸡媛 ɛkilon². le 长汀鸡媛子 tʃielü² · ʰtsə 于都鸡媛 ɛtɕielɔ² 宁都鸡口子 ɛtsailuon². ɛtsə 瑞金鸡口子 ɛkieluon², tsɿ（引自2000年第4期《方言》谢留文《汉语南方方言几个常用词的来历》）

二、客家的源流和名称、民系的形成

（一）客家的源流

客家是汉民族从中原移入赣、闽、粤边境山区的移民与土著民族融合而形成的一个群体或集团的名称，后来被公认为汉族的一个民系。这个民系由来已久，系统分明，特征显著。它的先民原居住在“北起并州上党，西届司州弘农，东达扬州淮南，中至豫州新蔡、安丰，即汉水以东，颍水以西，淮水以北，北达黄河以至上党”，特别是以中原司州、豫

州为其主要居住地。从西晋惠帝（司马衷）元康元年（公元 291 年）开始的八王之乱在黄河流域燃起战火，又因匈奴反晋，许多司州、豫州人不堪民族压迫和战乱骚扰，于是纷纷以家族为单位，举家举族向南迁徙，“远者自今日山西长治起程，渡黄河，依颍水，顺流南下，经汝颖平原达长江南北岸；近者由今日河南灵宝等地，依洛水，逾少室山，至临汝，亦经汝颖平原，达长江南北岸”（以上引文俱见罗香林《客家源流考》1933 年）。这些南迁者，其中不少是“过江名士”，也就是原来居住在洛阳地区的上层社会阶级。据《晋书·王导传》：“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此外，还有秦州雍州人、青州徐州人也参加了这南迁洪流。这就是历史上所谓“永嘉南渡”（公元 307—313 年）。晋宗室琅琊王司马睿在北方士族的拥戴下在建康（今南京）即帝位，建立了东晋王朝，拥有长江中下游等地区。这一民族大迁徙一直延续至五世纪中叶。这大批大批流民中，秦雍流民主要渡江流入洞庭湖区域，青徐流民主要渡江流入太湖区域以至浙江、福建，只有司豫流民连带一部分秦雍流民和青徐流民渡江流入皖赣边境山区及赣北鄱阳湖平原。广大平民百姓当时无地落脚，只得庇大姓以为客，他们就是第一批客家先民，中国正史称“中原汉人”（第一次迁徙）。到了唐代，受中期安史之乱和末期黄巢事变影响，他们的后裔被战乱所迫，又南迁赣、闽、粤边境山区：他们或溯赣江而上进入赣中南各县；或溯抚河、盱河进入赣东南和闽西，或东经乐平方向越仙霞岭沿武夷山东麓南下进入闽西、闽西南地区（第二次迁徙）。他们大批经石城等地向闽西宁化石壁及汀州等地迁徙。宁化位于武夷山南段，与江西石城交界，其地形四周高山环耸，中间开阔平坦，武夷山脉南端成为其天然屏障。石壁（现包括禾口（石壁镇）淮土二乡和方田、济村二乡的一部分）距闽西北与赣东南交界线上最为低矮的隘口叫站岭不到十公里，是闽赣两省的主要通道。石壁是一个方圆三百多平方公里的山中大盆地，周围有二百多个自然村，遂成为中原和江淮人民因避战乱而迁入闽西的最好落脚地，如李姓移民居桃树窝，罗姓移民居葛藤村紫原，陈姓移民居葛藤坳等（有 151 个客家姓氏的祖先从石壁迁出，现

在石壁客家公祠里摆放有 151 个姓氏牌)。

与此同时，遭受安史之乱和黄巢事变以及五代十国大分裂局面影响的他们的同乡司州、豫州一带人也不堪战乱骚扰大批南迁。当时豫南一带就有“黄巢起义死人八百万”和“七平光州”的传说。当时的闽西和粤东基本未遭战乱洗劫，相对安定，这些司州、豫州人许多便追随他们的先辈——永嘉之乱南迁的司豫汉人，直接（如李、薛等姓人由汴梁等地直接迁入宁化石壁）或间接（如罗、廖等姓人先迁虔州、零都后迁石壁）迁入该地区，这些人便是第二批客家先民。随着北宋末年金人南下和南宋末年蒙古人入侵，北方居民受战乱所迫又一大批一大批南迁，其中直接或间接迁入该地区者，便成为第三批也是人数最多、文化态势最占优势的最后一批客家先民。仅据旧《光州志》（清顺治十七年版）载：唐玄宗天宝年间，州属四县有 31472 户，198580 口，至宋徽宗崇宁年间，户口骤减至 12260 户，156460 口。迨至明洪武二十四年，光州户口仅剩 2167 户，14063 口。而宁化，据资料：唐高宗上元年间全县仅 2600 多户，多为土著，到北宋神宗元丰年间户口增至 13567 户，至南宋宁宗庆元年间，又猛增至 36700 余户，到宝佑年间又增至 37238 户，主客丁 89148 人（总人口约 14 万）；长汀在西晋太康三年称新罗县，居民不到五百户，除闽越、畚、峒蛮等，只有少数中原人，但到南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 年），临汀郡辖六县，人口骤增，主客已达到 208570 户。由此可见，由北宋以来迁入宁化、长汀地区的中原汉人之多。

赣、闽、粤边境同属丘陵山地，境内崇山峻岭，连绵不断；山谷间河流交替，大小盆地星罗棋布，气候温和，雨量丰沛。上古长江以南大片地区的居民称古越，西汉前称百越，又作百粤，有东越、闽越、瓯越、于越、西越、骆越、南越之分。在西汉，闽越和东越的首领被封为闽越王和东瓯王，赵佗被封为南越王，闽粤国和南海国被灭，其人民在汉军扫荡时大部被迫北迁江淮之间。唐以来的文献表明，山越、瑶特别是畚族（这地区土著少数民族名称见于文字的有俚、洛越、越人、夷獠、蛮獠、洞蛮、蛮亓、洞寇、峒獠、山越、畚、徭、蛋等多种叫法。20 世纪

90年代华裔美籍语言学家王士元教授等曾提取广东博罗县畲族人的内颊化验样本作Y染色体基因分析，确定畲族人与苗人和瑶人之间有亲缘关系——王士元《以现代科技拯救濒危语言》《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通讯》1998年第3期）早期的大本营即在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区。此地区原中原移民较少，他们是早在秦汉、东晋、南朝及隋迁入的。如秦时有一部分中原徐、饶等姓人已迁入洪州、率阳等地；秦屠睢所率五十万“南征百越之君”的五路军马中有“一军守南野之界”即今赣州地区南康县西南。在汉代，又有罗、丘、曾、管等姓人迁入豫章、上杭、吉阳、宁阳等地；汉武帝也曾派几路水陆汉军扫荡赣、闽等地。这地区的土著经济文化落后，处在原始民主制阶段，“随山洞而居”，“俱无君长”，“皆刀耕火耘”，与北方和江淮汉族人民相比存在很大差距，但因为离战争中心较远，较中原相对安定，所以成为中原和江淮人民避难逃亡的首选地，许多避难百姓都乐于赶赴此地。自唐末至南宋末，这一、二、三批客家先民经这两次迁徙，先后或陆续到达此地区特别是赣南和闽西，开发山区，艰苦创业，与居留原地的土著山越人和瑶、畲等族特别是畲族错居杂处。经过长期的接触和斗争，达到相互交流、合作、通婚、融合。从唐末经五代、北宋、南宋，四、五百年在文化上、心理上、习俗上长期掺和、交糅、渗透，于是融为一体，繁衍生息。后来由于人口的急速增加和受元人入主的影响，——元实行残酷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客家先民和畲民同被列为最下等的“南人，”所受苦难最为深重——赣南特别是闽西的客家先民，于宋元之际至明末，又大批向粤北及粤东迁入（第三次迁徙）。如宁化，由南宋末的37238户、主客丁89148人至清顺治年间已降至5267户、37888人。到此时期，客家民系始可以说最终形成了。居住在闽西、闽西南、粤北、粤东的这批辗转迁到的中原和江淮汉族移民，反客为主，成为这些地区的主人。他们由于是从外地迁入的，被称或自称为客家。而留在赣中、赣南的唐宋时客家先民的后裔这时已与当地赣人融合，已不自称为客家。现在赣南客家民系的主体，都是明中叶开始由闽西、粤北、粤东一带返迁回去的，即闽

西的宁化、清流、长汀、连城等县客家越武夷山而西进到石城、宁都、兴国、瑞金、会昌、于都、赣县等县；闽西的武平、上杭等县及粤东的平远、蕉岭、梅县、大埔等县客家越筠门岭而北进至寻乌、定南、全南、龙南、安远、会昌、信丰等县；粤东的五华、兴宁、龙川等县客家越大庾岭进入大余、崇义、南康、上犹等县。在清嘉庆年间，据《丰湖杂记》所载，客家民系的居住区域，包括“西向大庾，东向闽汀，纵横蜿蜒，山之南，山之北”，“即今江西之南安、赣州、宁都各属，福建汀州各属，广东之南雄、韶州、连州、惠州、嘉应各属，以及潮州之大埔、丰顺，广州之龙门各属”。他们长期在这一区域生息繁衍，从而形成在文化包括语言、历史、宗教、习惯、心态、思维方式等方面有显著差异的汉族群体、集团或民系。

这些生活在赣、闽、粤边境山区的客家群体、集团或民系，经过长期繁衍生息，人口遽增，于是又有第四次、第五次迁徙。清初，居住在粤东、粤北、赣南的客家人，在康熙中叶至乾嘉之际，一部分在“湖广填四川”时迁入四川、西康（会理），一部分迁入粤中、粤西、广西、湖南、贵州、台湾等地，是为第四次迁徙；乾嘉以后同治年间，由于受广东西路事件即新兴、恩平、台山、鹤山等地发生土客械斗以及受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失败影响，居住在粤中、粤东的一部分客家人又迁入高州、钦州、廉州和海南岛崖县、安定等地，是为第五次迁徙。至此，客家人居住区域已由赣、闽、粤边境山区扩展至福建、广东、江西、湖南、广西、海南、四川、台湾等省区。

关于民族融合，人类学家认为：人类连续不断的迁移造成了全球性频繁的血统混杂，促进了人口和文化的融合。在中国汉人和胡人的融合上，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教授曾说：“汉人与胡人之别，在南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人类学家亦认为，人是文化的动物，不同的族群能否凝成一个民族，关键在于文化的认同。大多数专家认为，只有把种族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或政治现象时，种族观念才有意义，而在科学上，

它是毫无意义的。据此，山越人、瑶人，特别是畬族人由于涵化作用——所谓涵化，是指不同文化的群体因持久相互集中的接触，两者相互适应，结果造成一方或双方原有的文化模式发生根本性的变迁——在涵化过程中，文化比较落后的这些少数民族一方的文化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而“汉化”即“客家化”了，即成为汉人，客家人。从历史上看，汉族也是民族融合的产儿，她在民族融合中形成，并逐渐壮大。汉族溯源于“华夏”，而“华夏”则是夏、商、周不同部族的结合体。夏族于公元前 21 世纪左右崛起于黄河中游河洛流域的黄土地带，其首领夏禹曾于河南省嵩县的涂山与南方各部落的首领举行会盟，而后南北各族接受夏文化而逐渐融合成夏部族。其后商、周，据 1950 年至 1975 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 8 具殷王族头骨和据传说、语言考证，“商人祖先为阿尔泰语系满一通古斯语族玄鸟部落，自贝加尔湖一带南迁，于夏末入主中原”（《文史知识》1993 年第 1 期唐喜纯《殷人秘史》）；周文王姬昌商纣王时为西伯，曾使虞、芮两国归附，后又攻灭黎、邶、崇等国。他们都曾与异族通婚，如殷纣王曾娶鬼侯（鬼方酋长）之女，周族统治者曾娶羌族、狄族和戎族之女。客家先民与这些土著民族通婚的，其后代当然属于客家人；即使这些民族的人，汉化即客家化了，也成为汉人、客家人。因为文化具有势差，先进文化影响落后文化，落后文化必然被先进文化所影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也认为：一种文明在它的生长时期，其旺盛的创造力可以使它在自己的内部和外部，在人们的内心引起自愿的“归附心理”。由于客家先民带来的是汉文化核心地带河洛地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化和文明，文化高，群体素质高，这些土著民族文化低、群体素质低，而且客居民的数量又大大超过土著民族，于是这些土著民族便主动向汉文化靠拢，并逐渐产生了对它的认同感和归附心理，从而被客居民所同化即汉化，成为客家和汉族的一员，而这些土著民族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和菁华便被客家民系所吸收而加强了客家民系文化，使之焕发出更为灿烂的生机。所以，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视角看，客家民系的根在中原，而不在当地。